

家庭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职业流动的影响*

——对苏中典型农村社区的考察

张锦华¹ 沈亚芳²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江苏省扬州市卸甲镇农村社区调查数据,考察了该社区住户 20 年来的职业流动情况,分析了家庭人力资本等因素对住户职业流动的影响。研究表明,该社区住户的职业流动比较活跃,其中,非稳定的兼业阶层具有最强的职业流动性;对于低职业阶层来说,人力资本对于其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具有最重要的影响,但对于高职业阶层来说,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则相对较强。大力发展包括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在内的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村家庭特别是低职业阶层家庭的人力资本水平,是促使其实现向上职业流动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人力资本 职业阶层 职业流动

一、引言

中国农民的职业变迁是现阶段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而人力资本对职业获得和职业流动的影响显而易见。在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农村居民的职业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人力资本在农户职业流动中起怎样的作用?如何促进农户职业的非农化和更稳定的职业流动?回答这些问题对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和顺利推进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此,本文拟利用 2011 年江苏省扬州市卸甲镇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考察住户职业流动状况以及人力资本对住户职业阶层流动的影响。首先,本文对该农村社区 20 年来住户职业流动情况进行简要概括;然后,对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经济计量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深入分析人力资本变量对住户职业流动所产生的边际效应;最后,对全文研究进行简要总结。

二、文献综述

目前,已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关注包括教育在内的人力资本因素对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影响。Manski (1992)、Johnson (2008) 指出,政府的教育政策、教育组织自身的功能与结构影响了社会流动。Lucas (2001) 认为,个人教育成就的取得受到自身所处社会阶层的影响,但教育的转型和改进有利于降低这种影响。陆学艺 (2002) 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经验事实证明,教育在中国社会分层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有研究关注人力资本的不平等对社会流动的消极意义。例如,Andrews and Leigh (2009) 运用跨国数据分析了包括收入不平等、教育不平等在内的社

*本文作者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1 年重大项目“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与城镇化问题研究”(编号:11&ZD037)、全国教育科学 2008 年国家青年项目“教育发展、社会分层与弱势补偿机制构建及政策研究”(编号:CAA080215)的资助。

会经济不平等与社会流动的关系，他们研究认为，在缺乏合理的社会矫正机制的情况下，社会经济不平等限制了社会阶层的正常流动，并且必然导致阶层的复制。总之，社会流动和教育有着密切的双向互动关系（Dong et al., 2009）。

职业流动和职业阶层区分是分析社会流动和社会阶层划分的主要依据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包括教育在内的人力资本因素改变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借助于其帮助个人或家庭获得不同的职业地位来实现的，就提高劳动者地位而言，人力资本投资比劳动者权益保护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姚先国、俞玲，2006）。白菊红（2004）发现，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农户从事非农产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史清华、徐翠萍（2007）根据长三角 15 村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教育或培训是影响农户家庭成员外出就业的重要因素。姚先国、俞玲（2006）进一步发现，文化程度对农民成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司职员的影响最为显著，职业培训经历有助于提高农民成为公司职员和在服务业、工业和建筑业等非农产业就业的概率。

但是，现有的研究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首先，关于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职业流动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Fuwa（1999）曾用多项 Logit 模型考察了菲律宾农村家庭的社会阶层流动，发现无论对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家庭人力资本（包括父母和 10 岁以上儿童的学校受教育年限的总和）对于非稳定的雇工家庭实现向小农场主或具有稳定非农职业家庭的向上流动都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而国内的研究往往集中于个体的职业选择，鲜见从整个家庭的角度考虑人力资本对职业流动的影响。其次，社会流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现有的国内研究以静态分析为主而缺乏动态的跟踪分析。由此，本文将利用最近的一套包含有追溯调查内容的农户调查数据，考察人力资本对农户职业阶层流动所产生的影响。

三、样本住户特征及其职业流动状况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来源于上海财经大学“教育发展与社会分层”课题组于 2011 年 8 月进行的江苏省扬州市卸甲镇农村住户调查。该镇所辖行政区域面积 122.24 平方公里，总人口 5.68 万人，下设 30 个居民社区和行政村。本文之所以选择江苏省扬州市卸甲镇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该镇在过去的 20 年中正处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在保留一部分传统农业的同时，工业正成为该镇重要的支柱产业，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1990 年的不足 50% 上升到 2010 年的 81%，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比例由 45% 下降到 15%，农村家庭的非农化职业流动相对较为充分。课题组随机抽取了该镇 1212 个住户进行了实地调查，获得了 2010 年的住户调查数据，并利用镇政府提供的基层普查数据获取了样本住户 2000 年和 1990 年的家庭人口、受教育水平等数据，还对样本住户的家庭财产状况等指标进行了追溯调查，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932 户。在被调查农村社区，许多家庭的子女通过高等教育等途径已经离开了农村，这本身也反映了农村家庭的职业流动，因此，本文的样本住户家庭成员中也包括已经成年的子女以及在城市立足的子女。

（一）样本住户特征描述

鉴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考察人力资本在农村家庭职业流动中的作用，因此，必须明确包括家庭人力资本、职业阶层划分等在内的一些基本概念。

首先，家庭人力资本是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存量，以家庭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家庭成员中收入水平最高的核心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来表示。其中，核心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包括核心劳动力成员的工作经验、是否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是否接受过职业培训等内容。为了比较分析人力资本的相对作用，本文研究中也引入了样本住户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指标。物质资本主要用住户

的存款、现金、非农生产性固定资产等数据来表示，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模式下，农户的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相当平均且数量很少，因此没有计算在内。社会资本是家庭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这里用保持人情往来的家庭状况好的亲戚朋友数量来表示，所谓家庭状况好，是指该家庭处于本文所定义的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或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其次，需要明确样本住户职业层级的划分标准。本文把一个样本住户中收入水平最高的成员作为其核心劳动力，依据核心劳动力的职业状况来衡量整个住户的职业层级。本文把样本住户的职业层级分为以下几种：①纯农就业阶层，就是住户核心劳动力基本从事农业，家庭收入主要（80%及以上）来源于家庭农业经营。②非稳定的兼业阶层，即住户核心劳动力既从事农业，又有相当时间从事非农业活动并获得一定收入，一般是在当地或外地企事业单位打工或从事个体经营。③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即住户核心劳动力具有稳定的和相当收入水平的非农职业，基本脱离了农业生产，包括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企事业单位中层管理者、村干部及普通公务员。④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从该农村社区的现实看，镇级及以上的干部掌握相关资源；同时，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由于占有较强的经济资源，在农村社区中也具有一定的政治资源。因此，本文将他们作为农村地区职业最高的层级。

表 1 分职业阶层的样本住户特征

变量	纯农就业阶层			非稳定的兼业阶层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各阶层住户所占比例 (%)	47.65	22.33	14.15	32.14	46.19	52.88
家庭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2.17	3.44	5.85	3.19	4.77	7.56
核心劳动力工作经验 (年)	16.17	18.22	21.12	15.09	16.35	17.12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者所占比例 (%)	7.07	10.73	15.33	13.98	18.11	26.55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培训者所占比例 (%)	2.34	6.44	12.19	8.14	16.17	24.99
家庭物质资本 (万元)	0.65	4.12	10.12	0.89	10.99	21.31
家庭社会资本 (人)	4.13	5.30	7.12	5.66	8.09	15.44
家庭年人均纯收入 (万元)	0.21	0.33	0.57	0.35	0.49	0.78
变量	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			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各阶层住户所占比例 (%)	15.09	27.11	27.34	5.12	4.37	5.63
家庭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4.39	7.19	10.19	4.12	6.99	10.98
核心劳动力工作经验 (年)	11.04	12.11	14.32	14.12	16.99	18.32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者所占比例 (%)	18.12	33.41	56.76	17.01	27.65	44.18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培训者所占比例 (%)	14.12	35.88	58.24	15.33	47.76	66.12
家庭物质资本 (万元)	2.33	15.38	33.56	3.24	39.09	96.12
家庭社会资本 (人)	7.12	12.11	18.17	10.22	27.89	44.12
家庭年人均纯收入 (万元)	0.31	1.05	2.14	1.67	2.16	4.22

注：除各阶层住户所占比例外，其他数据都为均值。

表 1 中的动态比较显示，非稳定的兼业阶层和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住户所占比例上升很快，纯农就业住户从 1990 年的近 50% 下降到 2010 年的不到 15%，所有住户的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核心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家庭物质资本也增长很快，这反映了近 20 年来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教育事业也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与此同时，农村住户之间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分布也更不均等，纯农就业阶层与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之间家庭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在 20 年间上升了 1 倍，核心劳动力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者所占比例的差距从 11 个百分点上升到 41 个百分点，接受过培训者所占比例的差距从 12 个百分点上升到 46 个百分点，基本上都扩大了 2~3 倍。同时，各职业阶层住户之间的经济差距也在迅速扩大，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与非稳定的兼业阶层之间家庭物质资本的差距扩大了 30 倍，农村社会经济分化的趋势日益显现。

(二) 样本住户职业流动状况

本文借鉴阶层流动矩阵方法 (Dardanoni, 1999) 建立职业流动矩阵，将纯农就业阶层、非稳定的兼业阶层住户作为低职业阶层，而将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住户作为高职业阶层，表 2 和表 3 给出了样本住户在 1990~2000 年和 2000~2010 年两个阶段的职业流动矩阵。根据表 2 和表 3，非稳定的兼业阶层具有最活跃的职业流动性：在第 1 阶段 (1990~2000 年)，保持在原层级的住户比例仅为 47.7%，超过一半的住户实现了向上或向下的流动；在第 2 阶段 (2000~2010 年)，有 47.5% 保持在原层级，27.8% 实现了向下流动，24.7% 实现了向上流动。纯农就业阶层住户在农村的比例并不高，但也有 40% 实现了向上流动。与之相对应，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最不活跃，在两个时段内分别有高达 69.9% 和 72.9% 比例的住户维持在原层级，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也分别有 67.4% 和 63.5% 比例的住户维持在原层级。因此，低层级特别是非稳定的兼业阶层具有极强的向上流动性，与此同时，正是由于其非稳定性，非稳定的兼业阶层住户也很容易向下流动，导致低职业阶层群体之间的变动较为频繁。

表 2 1990~2000 年样本住户的职业流动矩阵 (一)

职业阶层分类	纯农就业阶层	非稳定的兼业阶层	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	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纯农就业阶层	0.587	0.290	0.110	0.013
非稳定的兼业阶层	0.245	0.477	0.252	0.026
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	0	0.262	0.699	0.039
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0	0.125	0.201	0.674

表 3 2000~2010 年样本住户的职业流动矩阵 (二)

职业阶层分类	纯农就业阶层	非稳定的兼业阶层	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	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纯农就业阶层	0.635	0.256	0.101	0.008
非稳定的兼业阶层	0.278	0.475	0.229	0.018
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	0	0.110	0.729	0.161
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0	0.188	0.177	0.635

表 4 列出了样本住户职业流动情况的汇总。根据表 4，第 2 阶段低职业阶层向上流动的程度明显低于第 1 阶段，在第 1 阶段，41.3% 的纯农就业阶层住户、27.8% 的非稳定的兼业阶层住户实现了向上的职业流动，而到了第 2 阶段，只有 36.5% 的纯农就业阶层住户、24.7% 的非稳定的兼业阶层住户实现了向上的职业流动。同时，在样本住户中，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在两个阶段都没有流动到纯农就业阶层。这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职业的差异性开始显现，

低职业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可能正在变窄。

表 4 样本住户职业流动情况汇总

时段	纯农就业阶层		非稳定的兼业阶层		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		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向上	向下	向上	向下	向上	向下	向上	向下
1990~2000 年	0.413	0	0.278	0.245	0.039	0.262	0	0.326
2000~2010 年	0.365	0	0.247	0.278	0.161	0.110	0	0.375

四、住户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经济计量分析

本文这一部分运用概率选择模型对住户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经济计量分析。设样本住户职业流动状况为被解释变量 y 。样本住户流动到某一职业阶层时， y 取值为 1；否则， y 取值为 0。影响样本住户职业流动的解释变量向量（包括家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等因素）为 X_{it} ，可以分别采用面板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具体应该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需要通过 Hausman 检验来判断。从 Hausman 检验结果来看，本文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模型，从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当个体效应 α_i 为固定效应时，对于给定 X_{it} ，住户流动到某一阶层的概率 P_{it} 可由下式得到：

$$P_{it}[y_{it} = 1 | X_{it}] = \exp(\alpha_i + X_{it}\beta) / [1 + \exp(\alpha_i + X_{it}\beta)] \quad (1)$$

(1) 式中， β 表示与解释变量向量 X_{it} 相对应的系数估计值向量， i 表示样本住户， t 表示时期。具体估计结果详见表 5 和表 6。

(一) 低职业阶层住户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经济计量分析

表 5 显示，对纯农就业阶层的住户来说，家庭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核心劳动力人力资本相关变量对其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核心劳动力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接受过职业培训都有利于其实现向非稳定的兼业阶层和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流动。对向企业主或社会管理者阶层流动来说，家庭人力资本的效应并不显著，而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说明，对低职业阶层农户来说，实现这种变动非常困难，职业流动的关键是人力资本以外的因素。非稳定的兼业阶层农户是样本中占比例最大、职业流动最活跃的农户。

表 5 低职业阶层住户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 Logit 模型估计结果

	原阶层为纯农就业阶层		
	是否流动到非稳定的兼业阶层？ (是=1, 否=0)	是否流动到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 (是=1, 否=0)	是否流动到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是=1, 否=0)
	截距项	-3.742 (-1.98)	-6.743 (-2.46)
家庭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0.257* (-1.84)	0.421** (-2.77)	0.226 (1.66)
核心劳动力工作经验 (年)	0.247** (-2.75)	0.279** (-2.72)	0.451** (-2.81)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 (是=1, 否=0)	0.198* (-1.99)	0.558** (-4.14)	0.212 (1.22)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职业培训 (是=1, 否=0)	0.298** (-3.23)	0.298** (-2.37)	0.219 (-2.37)

(续表 5)			
物质资本 (万元)	0.012 (0.097)	0.022 (0.102)	0.505** (3.77)
社会资本 (人)	0.267 (1.56)	0.279* (2.01)	0.681* (2.08)
似然比检验			
χ^2	76.23	66.31	81.29
显著性水平	0.000	0.000	0.000
Hausman 检验			
$\chi^2(6)$	7.66	6.99	8.14
Prob > χ^2	0.000	0.000	0.000
对数似然值	431.23	479.12	512.33
	原阶层为非稳定的兼业阶层		
	是否流动到纯农 就业阶层? (是=1, 否=0)	是否流动到稳定的 非农就业阶层? (是=1, 否=0)	是否流动到企业主 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是=1, 否=0)
截距项	2.654 (-1.32)	-3.432 (-1.65)	2.418 (-1.22)
家庭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0.113 (-1.36)	0.442** (-3.77)	0.117 (1.55)
核心劳动力工作经验 (年)	-0.104* (-1.93)	0.575** (-3.74)	0.179* (-1.8)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 (是=1, 否=0)	-0.311* (-1.85)	0.479** (-3.07)	0.108* (-2.23)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职业培训 (是=1, 否=0)	-0.365** (-3.35)	0.417** (-3.19)	0.099 (1.02)
物质资本 (万元)	-0.103 (0.98)	0.044 (0.99)	0.598** (3.54)
社会资本 (人)	-0.112 (-0.44)	0.323* (1.96)	0.406* (2.13)
似然比检验			
χ^2	96.26	87.122	55.3
显著性水平	0.000	0.000	0.000
Hausman 检验			
$\chi^2(6)$	6.16	7.90	8.14
Prob > χ^2	0.000	0.000	0.000
对数似然值	389.72	698.65	221.13

注: **、*分别表示在 5%、10%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是 z 检验值。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看, 家庭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对非稳定的兼业阶层住户向下流动影响并不显著, 核心劳动力工作经验、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和接受过职业培训则有利于阻止其向下流动。同时, 家庭人力资本对其实现向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流动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无论是家庭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还是核心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都有利于推动非稳定的兼业阶层住户向稳定的非农职业阶层流动。因此, 对低职业阶层农户来说, 要实现向稳定的职业阶层流动, 包括教育和培训在内的提升家庭人力资本水平的策略非常重要。

(二) 高职业阶层住户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经济计量分析

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是所有阶层中最稳定的职业阶层, 该阶层住户的家庭收入和社会关系实际

上已经脱离了农业，样本住户家庭中部分成员通过迁移甚至已经脱离了农村社区。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住户一般具有专业知识或技能，劳动分工不断细化和专业化导致了一套系统的以技术等级或专业化程度为基础的职业分化体系，由于专业化程度高的职业往往获得越来越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声望，因而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在所有职业阶层中是最稳定的，在样本中几乎没有向纯农就业阶层流动的住户。在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向非稳定的兼业阶层流动的影响因素中，核心劳动力工作经验和接受过职业培训起到负向作用，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对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实现向上流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来说，家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均有利于其向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流动，但当其向非稳定的兼业阶层流动时，人力资本各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而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起到了有效的抑制作用。

表 6 高职业阶层住户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 Logit 模型估计结果

	原阶层为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		原阶层为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是否流动到非稳定的兼业阶层? (是=1, 否=0)	是否流动到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是=1, 否=0)	是否流动到非稳定的兼业阶层? (是=1, 否=0)	是否流动到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 (是=1, 否=0)
	截距项	-1.844 (-1.02)	4.265 (2.36)	-4.012 (-4.322)
家庭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0.097 (-1.01)	0.283** (2.33)	-0.035 (0.16)	0.283** (2.33)
核心劳动力工作经验(年)	-0.133* (1.88)	0.349** (3.21)	0.008 (0.16)	0.345** (2.77)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是=1, 否=0)	-0.114 (-1.22)	0.178* (1.89)	-0.117 (1.69)	0.178* (1.89)
核心劳动力接受职业培训(是=1, 否=0)	-0.244* (1.92)	0.001 (0.03)	0.121 (1.77)	0.121 (1.63)
物质资本(万元)	-0.033 (-0.77)	0.501** (3.66)	-0.261* (2.44)	0.501** (3.66)
社会资本(人)	-0.068 (-1.10)	0.343** (3.01)	-0.123* (1.98)	0.343** (3.01)
似然比检验				
χ^2	65.55	77.57	48.09	39.12
显著性水平	0.000	0.000	0.000	0.000
Hausman 检验				
$\chi^2(6)$	7.22	8.76	7.15	9.11
Prob> χ^2	0.000	0.000	0.000	0.000
对数似然值	456.17	362.17	433.19	421.52

注: **、*分别表示在 5%、10%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是 z 检验值。

五、家庭人力资本影响住户职业流动的边际效应分析

上文运用面板 Logit 模型分析了住户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 在此基础上, 下面利用表 5 和表 6 中的估计结果计算各变量对住户职业流动概率的边际效应, 考察哪些因素在职业阶层流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些因素是阻碍还是促进了职业阶层的流动。

(一) 家庭人力资本对职业阶层流动概率的边际效应

表 7 列出了各种影响因素对于低职业阶层住户职业流动概率的边际效应。根据表 7, 对纯农就业阶层和非稳定的兼业阶层来说, 他们向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其核心劳动力是否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 其边际效应分别达到了 0.334 和 0.342, 高于其他因素。但是, 学历教育并不是影响住户职业流动的唯一重要因素, 核心劳动力是否接受过职业培训是纯农就业阶层住户向非稳定的兼业阶层流动的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其边际效应达到 0.396; 在非稳定的兼业阶层的向上流动中, 核心劳动力是否接受过职业培训也起着重要作用, 其边际效应为 0.351。家庭人力资本不仅起到了促进低职业阶层住户实现向上职业流动的作用, 同时还会阻止较高职业阶层住户发生向下的职业流动。根据表 7,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和接受过职业培训对非稳定的兼业阶层向下流动到纯农就业阶层的边际效应分别是-0.275 和-0.241。

表 7 解释变量对低职业阶层住户职业流动概率的边际效应

	原阶层为纯农就业阶层		
	是否流动到非稳定的兼业阶层?	是否流动到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	是否流动到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是=1, 否=0)	(是=1, 否=0)	(是=1, 否=0)
家庭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0.119	0.201	—
核心劳动力工作经验 (年)	0.207	0.102	0.278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 (是=1, 否=0)	0.256	0.334	—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职业培训 (是=1, 否=0)	0.396	0.359	—
物质资本 (万元)	—	—	0.233
社会资本 (人)	—	0.112	0.398
	原阶层为非稳定的兼业阶层		
	是否流动到纯农就业阶层?	是否流动到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	是否流动到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是=1, 否=0)	(是=1, 否=0)	(是=1, 否=0)
家庭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	0.114	—
核心劳动力工作经验 (年)	-0.154	0.145	0.117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 (是=1, 否=0)	-0.275	0.342	0.112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职业培训 (是=1, 否=0)	-0.241	0.351	—
物质资本 (万元)	—	—	0.365
社会资本 (人)	—	0.104	0.378

注: 由于部分变量的 Logit 模型估计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不再计算其边际效应, 用“—”表示。

表 8 列出了各种影响因素对于高职业阶层住户职业流动概率的边际效应。根据表 8, 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要实现向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向上流动, 家庭所拥有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成为了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其边际效应分别为 0.699 和 0.388; 家庭人力资本的作用则相对较小, 但核心劳动力工作经验和核心劳动力接受过培训却可以有效阻止其向下流动到非稳定的兼业阶层。对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来说, 较高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起到了阻止其向下流动到非稳定的兼业阶层的作用, 但是, 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住户要流动到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 仍然需要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

表 8 解释变量对高职业阶层住户职业流动概率的边际效应

	原阶层为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		原阶层为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是否流动到非稳定的兼业阶层? (是=1, 否=0)	是否流动到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是=1, 否=0)	是否流动到非稳定的兼业阶层? (是=1, 否=0)	是否流动到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 (是=1, 否=0)
家庭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	0.321	—	0.313
核心劳动力工作经验(年)	-0.217	0.212	—	0.377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是=1, 否=0)	—	0.094	—	0.271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职业培训(是=1, 否=0)	-0.378	—	—	—
物质资本(万元)	—	0.699	-0.309	0.229
社会资本(人)	—	0.388	-0.149	0.166

注：由于部分变量的 Logit 估计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再计算其边际效应，用“—”表示。

(二) 进一步的探讨

家庭核心劳动力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之所以能成为低职业阶层住户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可以从信号筛选理论得出相关的解释。根据信号筛选理论，一个人的能力与获得信号所需花费的成本成反比，能力较高的人支付较低的成本就可以获得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因而受教育水平是反映个人能力大小的有效信号，是雇主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鉴别求职者能力，并对他们进行筛选的一种有效依据。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稳定的非农就业一般对求职者工作能力有更高的要求，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受教育水平往往成为选拔求职者的重要依据。张林秀等（2000）研究发现，雇主在选择雇员时会给予受过较高水平教育的人以更多的就业机会。在过去的 20 年中，中国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6.142 年上升到 8.401 年，农村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为低职业阶层的向上流动提供了重要机遇。

与此同时，职业培训在农村住户职业流动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学历教育，接受过职业培训成为低职业阶层住户实现向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流动的最重要影响因素。这可以从人力资本理论得到解释。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和培训能提高人的认知能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边际产出。更高的职业对劳动力有更高的学历和技能要求，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者更能够获得就业机会，从而实现向上流动。农村住户从低端职业阶层向高端非农就业阶层流动就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从事农业的劳动力逐步减少，非农就业的劳动力逐步增加，非农部门对劳动者人力资本的需求也增加。相对而言，职业培训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比学历教育更明显，因而成为促进农业劳动者向兼业阶层流动的最重要因素。对于低职业阶层住户来说，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或职业技术培训是实现其职业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反之，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家庭由于对教育的投资不充分，可能陷入 Azariadis and Drazen(1990) 强调的低发展陷阱，从而很难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随着中国教育的分层化发展，多层次的教育体系日益显现出其社会意义，发展针对农村居民的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对推进其向上的职业流动具有重要作用。

五、小结

基于上海财经大学“教育发展与社会分层”课题组 2011 年 8 月在江苏省扬州市卸甲镇农村社区所做的住户调查,本文考察了 20 年来农村住户的职业流动状况,对影响农村住户职业流动的家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因素进行了经济计量分析,并对各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研究主要得到如下结论:首先,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样本住户的职业流动比较活跃,其中,非稳定的兼业阶层具有最强的职业流动性;其次,对于低职业阶层来说,人力资本对于其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具有最重要的影响,但对于高职业阶层来说,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则相对较强。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了促进农村居民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应当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同时,农村教育也要积极实现从单一的学历教育向包括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在内的多层次教育的转变。

参考文献

- 1.Azariads, C. and Drazen, A.: Threshold Externalit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5(2): 501-526, 1990.
- 2.Manski, C. F.: Educational Choice (Vouchers) and Social Mobility,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11(4): 351-369, 1992.
- 3.Andrews, D. and Leigh, A.: More Inequality, Less Social Mobility,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16(15): 1489-1492, 2009.
- 4.Dong, Z. F., Wang, Y. B. and Chen, W. J.: Social Mobility and Educational Selection, *Front Education China*, 4(4): 610-623, 2009.
- 5.Fuwa, 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in a Village Community: The Case of a Philippine Village,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1(1): 101-138, 1999.
- 6.Johnson, O.: Ecology in Educational Theory: Thoughts on Ecology, Stratification and Proximal Capital, *The Urban Review*, 40 (3): 227-246, 2008.
- 7.Dardanoni, V.: Measuring Social Mo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61(2): 372-394, 1993.
- 8.Lucas, S. R.: 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ducation Transitions, Track Mobility, and Social Background Effec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6): 1642-1690, 2001.
- 9.白菊红:《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民收入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
- 10.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 11.史清华、徐翠萍:《农户家庭成员职业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自长三角 15 村的调查》,《管理世界》2007 年第 7 期。
- 12.姚先国、俞玲:《农民工职业分层与人力资本约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9 期。
- 13.张林秀、霍艾米、罗斯高、黄季焜:《经济波动中农户劳动力供给行为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0 年第 5 期。

(作者单位: ¹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²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 杜 鑫)